

努力培养双言双语人*

李宇明

内容提要 当代的语言规划, 必须处理好语言保护和语言沟通的关系。造就大量的双言双语人, 特别是强势的双言双语人, 是统筹解决语言保护和语言沟通关系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还有大量的单言单语人, 弱势双言双语人的比例过大, 普通话和外语教育的起始年龄偏大, 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也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规划。

关键词 语言保护 语言沟通 双语 双言

语言保护和语言沟通, 是当代语言生活的两大课题, 也是牵涉到国家语言政策的两大课题。解决这两大课题必须统筹考虑, 只谈语言保护还是只谈语言沟通, 都难免片面; 孤立地强调语言保护或语言沟通, 都会带来社会问题。中国是一个多方言多语言多文化的发展中的大国, 语言资源异常丰富, 语言问题也相当复杂, 因此, 合理解决语言保护和语言沟通的问题, 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和急迫。本文认为, 造就大量的双言双语人, 是统筹解决这两大课题的重要途径。

一 语言生活的两大课题

语言生活是一个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的概念。李宇明(1997)曾经指出:“凡学习、运用和研究语言文字的各种活动, 以及对语言文字研究成果的各种应用, 都属于语言生活的范畴。”依此理解, 语言生活的领域是异常广阔的, 它在整个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也是十分重要的。从语言规划的角度看, 语言生活中两个颇为重要的课题是: a) 语言保护; b) 语言沟通。

1. 1 语言保护

语言是十分宝贵的社会资源。我国的语言资源十分丰富。首先, 汉语是世界上少有的、方言如此分歧复杂的语种。从史的方面着眼, 方言是古代语言和古代文化的“化石库”。方言中保存着大量的古代语言的成分, 通过不同方言的比较研究, 可以拟测古代语言的面貌, 发现语言发展演变的规律。方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负载者, 民族文化不是抽象的, 是由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综合构成的。在方言及其所负载的地域文化中, 蕴含着古代的民族成分, 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从现实和未来着眼, 方言是滋养民族共同语发育的“营养基”。基础方言规定了民族共同语的基本面貌, 推动着共同语的发展, 但是, 基础方言之外的非基础方言, 在民族共同语的发展中也具有重要作用。1980年代以来, 现代汉语发生了并正在发生着重要变化, 粤方言、闽方言、吴方言等南方方言(包括海外华人社区使用的“华语”), 以及在方言基础上所形成的“地方普通话”, 为20余年来现代汉语的变化作出了有目共睹的重要贡献。当代新词新语的产生、外语词语的译借、新句法格式的出现和语体风格的嬗变, 有许多都应归功于这些方言。因此, 不管是着眼于历史还是放眼现在与未来, 众多的汉语方言都是不可多得的语言财富和文化财富, 都是具有极大的开发利用价值的语言资源和文化资源。

中国境内有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印欧语系、马来~玻里尼西亚语系等五个语系的语言, 周庆生(2000, P98)认为我国的语言有80多种。由于语言与方言的界限本非泾渭分明, 也有学者认为我国的语言有100多种。我国究竟有多少种语言, 有待进一步研

* 此文曾经在“香港多语多文化研讨会”(1997年3月, 香港大学)上宣读。此次发表, 作了较大修改。

究,但这些语言无疑都是语言学的宝库,为汉藏语系的谱系比较研究,为语言类型学、语言联盟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基础条件。民族语言是民族传统属性的重要标志之一,系连着民族的情感,它的地位和命运在一般情况下也体现着或关系着它所属的民族的地位和命运。民族的语言也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众多的民族语言,代表着众多的文化样式。不同文化的接触和交融可以推动文化的快速发展,甚至可以创造出新的文化。因此,众多的语言及其所代表的众多的文化样式,是财富,是可供开发利用的资源。

但是应当看到,随着各地、各族人民和国内外的交往越来越密切,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越来越迅速,随着因特网的使用越来越普遍,汉语各方言和许多民族语言的面貌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一些汉语的土话和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正在消亡。在社会历史进程中,一些方言和语言的消亡也许难以避免,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对濒临灭亡的方言和语言无动于衷。语言不同于其他东西,一旦消亡就很难复活(希伯来语也许是个消亡之后又复活的例外),也无法复制。语言消亡也将带来文化、次文化的消亡或“化石化”。因此,语言保护(或曰语言~文化保护)已刻不容缓。

当前,愈来愈多的人已经认识到了环境保护、物种保护、水土保护、文物保护等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社会宣传的力度、采取的保护措施和投入的人力物力都比较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却很少有人意识到语言保护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1.2 语言沟通

在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新秩序中,在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每个地区、每个民族都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各地区各民族为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必须相互接触、相互了解和理解,必须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与合作,以减少分歧、误解和争端,共同进步,携手发展。地区间民族间的接触、交流与合作,必以语言为先导,因此,需要语言沟通(或曰“语言~文化沟通”)。

汉语各方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缩小差异,“众星拱月”般地向普通话靠拢;国内外各语言间的相互接触、相互渗透也日渐增多。不同地区、国内各民族和国内外的语言沟通,在我国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但是方言间的隔阂和语言间的沟壑,仍极大地妨碍着人们的语言交际和文化交流,大大小小的、或隐或现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国内的和国际的语言冲突和文化冲突时有发生。因此,在当今中国的语言生活中,既需要考虑语言保护问题,保护和开发各种语言资源和文化资源,繁衍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包括次文化),保持其地域特色和民族属性,又需要认真解决语言沟通的问题。

1.3 双言双语人

语言沟通与语言保护具有一定的矛盾性。语言的沟通往往影响到对语言的保护,过分的不恰当的语言保护则势必影响语言沟通。二者之间的矛盾性,决定了必须统筹考虑语言保护和语言沟通的问题。寻求二者兼顾的语言对策,是宏观社会语言学的一项重要使命。我觉得,造就大批的双言双语人(当然也包括“多言多语人”),是解决语言沟通与语言保护这对矛盾的一种较好途径。

双言人是指起码能够使用两种方言的人,双言人所使用的方言中,一般有一种是“母言”。双语人是指起码能够使用两种语言的人,双语人所使用的语言中,一般有一种是母语。在获得和使用母言、母语的过程中,双言双语人便把某种方言、某种语言及其所植根的文化继承下来,并繁衍开去,起到了一定的语言保护作用。在获得另一种方言、另一种语言的过程中,双言双语人也了解了另一种方言、另一种语言及其所植根的文化,并具有了同另一方言区、另一语言社团的人进行语言交往的能力,实现了语言沟通。而且,双言双语现象可以具有较强的稳固性,有些民族的双言双语现象已经持续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因此,造就大量的双言双语人,可以兼顾语言保护和语言沟通。

二、培养双言双语人存在的若干问题

双言双语人古已有之。王健庵(1992)、喻遂生(1993)、金若(1993)等对《诗经》和两周金文韵文的研究表明, 起码在西周时代汉语已有方言存在。有方言和方言间的交际, 就必然有双言人。汉族与周边民族的交往起码在甲骨文时代已经开始, 语言是民族交往的先导, 因此, 起码在殷商时代就有双语人存在。双言双语人历代不绝, 他们为地区间和民族间的交流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教育是大批量造就双言双语人的重要途径。清代洋务运动时期, 开办了“广方言馆”、“同文馆”等外语学校, 清朝末年兴起了国语运动, 从而使双言双语人才的培养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在 100 多年的历史进程中, 我国通过教育等方式培养了许许多多的双言双语人。

1950 年代以来, 我国大陆在推广普通话和外语教育等文化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培养了数以亿计的双言双语人。关于我国培养双言双语人方面的成绩, 在政府文献和许多论文论著中都已反映, 本文只打算讨论一下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我觉得, 我国在造就双言双语人方面存在的值得考虑和重视的问题主要是:

2. 1 存在大量的单言单语人

只会讲一种方言的人称为“单言人”, 只会讲一种语言的人可称为“单语人”。一般说来, 单言人一定是单语人, 但是单语人不一定是单言人。现在, 我国许多人的语言生活仍然是单言单语式的。从地域分布上看, 单言单语人主要集中在交通、通讯不发达的地区(民族杂居地区除外), 从社会分布上看, 年龄较大和文化水平较低的人群中, 单言单语人的比例较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我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成就虽然创造了人类教育史上的奇迹, 但是仍然存在着一数量青壮年文盲或半文盲, 在一些贫穷落后地区, 少年儿童失学辍学的现象仍不罕见, 新的文盲和半文盲不断孳生。文盲和半文盲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单言单语人, 这就意味着单言单语人还在批量产生。大量的单言单语人的存在, 无疑会严重地影响地区间、民族间、国家间的语言沟通。

2. 2 弱势双言双语人的比例过大

任何语言乃至任何方言, 在法律地位上和社会道义上应一律平等, 没有优劣高下之分。但是, 在现实语言生活中, 由于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和使用人口等方面的种种差异, 而使得不同的语言或方言在交际价值方面有强势和弱势之分。一般说来, 使用范围较广、交际价值较高的语言和方言是强势的, 使用范围较窄、交际价值较低的语言和方言是弱势的。

就当前我国的语言生活来看, 普通话是强势方言(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看, 普通话也是一种方言, 是地位较高的权威方言), 汉民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 汉语的使用范围较广, 科技含量较高, 在法律上具有“国家通用语言”的地位, 是中国诸语言中的强势语言。就世界范围来说, 一些大语种, 特别是英语的使用范围较广, 交际价值较高, 是强势语言。

能较好地掌握和使用强势方言、强势语言的双言双语人, 是“强势双言双语人”。在所掌握的双言双语中没有强势方言、强势语言的双言双语人, 或不能较好地使用强势方言、强势语言的双言双语人, 是“弱势双言双语人”。弱势双言双语人比之单言单语人, 在语言沟通方面稍有优势, 但其优势远不如强势双言双语人。

在我国的双言双语人中, 弱势双言双语人的比例过大。许多双言人所掌握的方言中没有普通话这种强势方言, 或者说的是方音特别重的“地方普通话”。许多操双语的少数民族成员, 或者其双语中没有汉语, 或者会说汉语但是说的是某种弱势的汉语方言(包括“地方普通话”)。许多人不会说外语, 许多会说外语的中国人, 其外语水平也相对较低, 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能用外语进行较为自如的全方位的交际, 他们也是弱势双语人。

弱势双言双语人比例过大的原因主要有二: 其一, 我国语言教育的范围和质量都还不够理想。大陆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开展了几十年, 但是由于人口众多, 方言复杂, 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粤语北上”的影响和其他社会因素的干扰, 能够讲普通话的人仍然集中

在某些行业、某些地区和某几个年龄段。外语教育的范围和条件比起普通话教育来就更为有限。

其二，许多双言双语人一般都是“自然双言双语人”。自然双言双语人不是通过正规教育的途径获得第二方言、第二语言的，而是由于迁徙、旅居、杂居或生活在双言双语环境中自然而然习得（Acquisition）的。由于我国的语言分布状况，自然习得普通话的机会并不很多，如分布在我国东北、西北和西南的少数民族，即使掌握了汉语，也多是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的汉语方言，而不是普通话。南方方言区的人，自然习得的第二方言也多是南方的方言或带有较强南方味的地方普通话。

2.3 普通话和外语教育的起始年龄偏大

应该承认，我国对普通话教育和外语教育是相当重视的，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但是效果并不怎么理想。社会用于语言教育的投入、个人用于语言学习的投入都很大，但是，投入与产出很不成比例。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最为主要的原因，我认为是普通话和外语教育的起始年龄偏大。

伦内伯格（E. Lenneberg）、彭菲尔德（W. Penfield）等人的研究表明，语言学习在年龄上有最佳期和临界期。查穆伯斯（J. K. Chambers）在《方言习得》（Dialect Acquisition）一文中把语言习得者分为“早期习得者”和“晚期习得者”，并颇有见地地指出：早期习得者（7岁和7岁以下）可以顺利习得语言，晚期习得者（14岁和14岁以上）几乎不能顺利习得语言；7至14岁之间的人，有的属于早期习得者，有的属于晚期习得者。学术界虽然对语言学习最佳期、临界期的年龄还有不同看法，但多数研究者认为，语言学习的最佳期在7岁左右，临界期在13岁左右。7岁之前可以较快地、地道地掌握任何一种口语，临界期以后再学习语言就比较困难，而且难以学得地道。

在我国大陆，条件较好的城市学校，多数是在小学高年级开始教外语，条件较差的乡镇学校，多是在中学才开设外语课。学生开始学习外语的年龄已接近临界期或在临界期之后，加上学生的外语成绩与升初中、升高中的关系并不太密切，一般都收效不大。绝大多数人的外语其实是在大学或专门的外语教育机构学习的。近年来，一些小学、中学和大学正在努力加强外语教学，比如一些大学，要求某些课程用外语讲授，一些中小学尝试进行“汉外双语教学”。这些措施还都处在试验阶段，而且还有许多政策性、学术性的问题需要解决，其效果如何亦需实践的检验。

学校的普通话教育状况比外语教育状况稍好一些，但是，使用方言和地方普通话进行教学的学校并不在少数，特别是高等学校（师范类的高等学校情况好一些）、乡镇学校和南方方言区的学校。许多学生在语言学习的临界期之前并未掌握普通话。

由于普通话和外语教育的起始年龄偏大，造成了普通话教育和外语教育的高投入低产出，造成了全社会的普通话水平不高和外语水平低下的局面。语言教育的起始年龄偏大，固然与教育条件（如师资条件等）有关，但主要是因在教育指导思想和语言教学等方面忽视语言学习规律，而且对造就强势双言双语人的意义缺乏足够的自觉的认识。

2.4 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问题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地区的教学语言是一个较为敏感的问题。许多专家认为，语言教育中使用母语，可使个人充分发展，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得到保存和延续；学习主体民族的语言，不仅有助于民族间的理解、交流与团结，而且也有利于少数民族自身的发展。因此，在中国的民族大家庭中，少数民族实行双语制，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双语教育，从任何角度看都是正确的、必要的。当然，少数民族的双语教育应遵从少数民族自己的愿望，尊重少数民族的家长与学生自己的选择。

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有许多问题值得思考和研究，例如：

a) 在哪个年龄阶段，或者说在儿童的母语发展到何种水平时开始进行汉语教育最为合适？

b) 在儿童语言学习的临界期前后, 是否有可能完成最基本的双语教育(特别是第二语言的口语教育)?

c) 母语与汉语在教学中如何分工与合作? 比如, 哪些课程适合用母语教学, 哪些课程适合用汉语教学?

d) 怎样提高少数民族语言的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文化的含量, 提供较为充足的适合少数民族学生学习的母语和汉语的课外读物。

三 结语

无论从今天所处时代还是从我国的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着眼, 都必须对上述问题采取积极而有效的对策, 特别是要加强对双言双语现象、双言双语教育和双言双语人的研究。坦诚地说, 人们对双言双语的认识还相当有限, 重大的社会文化活动, 必须有坚实的科学研究的基础, 不能仅凭热情和轰轰烈烈的运动。我感到, 需要研究的课题起码有如下一些:

a) 中国双言双语的历史考察。以史为鉴则明。

b) 中国双言双语的现状、问题与对策。这方面要特别注重田野调查和实证性研究, 制订对策要以宏观社会语言学理论和应用语言学的理论作指导, 要富有远见, 要符合国情。

c) 双言双语教育的规律及教育改革。双言双语教育应遵从语言学习规律。语言学习规律是我国学术研究中的薄弱领域。就各种类型的语言学习而言, 儿童第一语言习得是最为成功的, 应加强对第一语言习得的研究, 从中获取有益借鉴。

d) 双言双语人的心态与优势。

e) 大批量培养双言双语人的规划与措施。规划与措施要具有可操作性, 要有法律效力。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 随着普通话在国内的推广, 可能会出现新的单言单语现象。比如有些儿童可能只学习普通话而不再学习方言, 成为新的单言人。有些少数民族的儿童, 可能只学习汉语而不学习母语, 或者把母语学习看作是掌握汉语的“拐杖”, 学会了汉语就把母语的拐杖甩掉了, 从而成为新的单语人。如何看待这种新现象, 也值得研究。

总之, 语言是文化、次文化纵向传承的“基因”, 是不同文化、次文化横向交融的梁津。语言资源的保护与开发, 就某种意义而言, 比物种资源、文物资料的保护与开发更为重要。应加紧对我国方言和语言的调查研究, 建立能保存方言和语言真实面貌的语言档案, 设法创造一个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与此同时, 在现代科技、政治、经济等大背景下制订语言沟通战略, 争取在不长的时期内培养出大批的强势双言双语人, 以利于国际国内的交流与合作, 以利于中国迅速地走向现代化。

主要参考文献

陈恩泉等 1994 《双语双方言(三)》, 汉学出版社。

陈前瑞 1994 方言习得的八条原则——介绍 J. K. Chambers 的《方言习得》, 《国外语言学》第 3 期。

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 1990 《各国推广本族语情况汇编》,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法规室 1995 《语言文字工作百题》, 语文出版社。

金 若 1993 《诗经》韵系的时代分野, 《古汉语研究》第 4 期。

李宇明 1995 《儿童语言的发展》,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李宇明 1997 语言保护刍议, 深圳语言研究所编《双语双方言(五)》, 汉学出版社。另载《中国民族语言学会通讯》1998 年第 1 期。

眸 子 1997 语言生活与精神文明, 《语文建设》第 1 期。

孙宏开 1983 试论我国的双语现象, 《民族研究》第 6 期。

王健庵 1992 《诗经》用韵的两大方言韵系, 《中国语文》第 3 期。

邢福义等 1990 《文化语言学》, 湖北教育出版社。

许嘉璐等 1996 《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严学宥 1985 《中国对比语言学浅说》, 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语文出版社 1993 《语言文字规范手册》(增订本), 语文出版社。

喻遂生 1993 两周金文韵文和先秦“楚音”, 《西南师大学报》第 2 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2000 《世界语言报告(中国部分)》。

- 周庆生 2000 《语言与人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周庆生主编 2001 《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语文出版社。
周有光 1992 《新语文的建设》，语文出版社。